

“文化标志城”标志的是生意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安家瑶表示,她与社科、文艺等界别的百余位政协委员将于今天向大会提交提案:中华文化标志城,是打着文化名义破坏历史遗产和传统文化环境,发改委应慎重论证,否则不仅是对“国库”的浪费,还会引起各地争相效仿。安家瑶称,提案将有120位委员的签名。

(《新京报》3月11日)

[南都一评]

孙淑义委员“指出”:本世纪初这项工程就由中央和地方领导、院士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倡议,并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和海内外同胞的热烈响应,现在专家也论证了,发改委也批准了,国家层面要在政策上支持,使之具有“法定性、唯一性和权威性”,成为国家文化庆典的法定场所,建设资金纳入国家预算,建立工程的国家指导协调机制,争取全党全社会和全世界华人的广泛支持。

钱要国家出,地位要法定,还要“唯一性”,别的地方不许再搞。全球中华儿女,只能戮力贡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即使知道了山东方面的经费计划,我仍然认为,这个足以被称为旷世奇闻的工程,最荒诞的不是它要大家“戮力同心”去起大屋,而是“中华

↓“文化标志城”标志的不是文化 《南方都市报》3月12日 作者 刘洪波

文化标志城”这个不知是个什么东西的鬼名称。据称,这个城要建成中国的“文化副都”“圣城”“朝圣地”。不管都也好,城也好,总得是人生活的地方,而不是一个白天空落落或者游客满地走,夜晚城门一锁空无一人的景点。这个“文化标志城”,是在一座叫九龙山的山上大兴土木,想必就是一个大型景点,不是人们生活的场所。联合国评世界文化遗产还特别强调遗产与生活现实的联系呢,“文化标志城”却要排斥人类生活,一堆物件摆在那里,说这能标志“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也只配被它羞死。

[快报再评]

作者似乎一语中的,揭示这个所谓“中华文化标志城,标志的不是文化,而是生意经”。这种责备可以说太轻太轻,人家根本不在乎。因

为二十多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毫不讳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济宁不过是想搭个中国之最的“文化”戏台罢了。人家有圣贤孔孟做“资源”,怎么能不利用一把?这后面的“文化背景”其实很明确,一是想借祖宗做幌子发财;二是中国经济繁荣起来了,“扬我国威”的国粹派又有了机会。

乃至有人提议,定儒学为国教,征收孔教税、制国服,还有什么专利版的孔子标准像。这是“文化”吗?是反文化,或者说专制文化、落后文化。因为政教分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

从政治文明角度来看,这么一大项工程,如果只要领导批示、“专家”论证、发改委批准,而不经过公众辩论、人大审议,就“肯定要建”,那肯定不符合民主决策的程序,是没有政治合法性的。也就是说,若有人坚持这么做,正是没文化的标志。

北大清华的门 别只朝北京孩子开

↓“一名中学教师眼中的高考公平” 新华网 3月13日 作者 易晓兰(中学教师)

为什么京津沪的孩子能轻松踏进大学校门,而河南的孩子十几年寒窗苦读,却可能与大学无缘?这是因为现行的高考制度存在不公平问题。近日,全国人大代表王刚等向大会递交建议,呼吁改革现行高考制度,实行真正的高考统招——全国统一试题、统一录取分数线,以促进高考公平。

(《东方今报》3月11日)

[新华一评]

现行高考制度确实不公平,笔者作为河南省的一名中学教师,对此深有感触。河南省是人口大省,考生较多,但分配到的招生指标却并不多,导致录取比例一直很低——这其实也是一个全国性问题。以2007年高招为例,录取率最高与最低的省份相差近1倍。

这些问题,多年以前人们就在谈论和呼吁,问题是明摆着的,道理也很明了,但这么多年过去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省份实行自主命题;北大、清华等名牌高校虽为教育部直属,即属于面向全国招生的高校,但他们对本地考生的招生名额却连年升高,这实际上是一种高考特权。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王刚等代表提出的全国统一考试、统一录取分数线,我觉得并不可行。一方面,自主命题的省份越来越多,这个潮流不可逆转,并且自主命题确实大于弊;另一方面,全国统一录取分数线,那么像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的考生怎么办?在统一的分数线下,越是基础教育资源薄弱、教育水平较低的省份的考生越是吃亏。

其实,不必统一考试、统一录取分数线,也能实现高考的相对公平,那就是均衡高招指标分配,按考生人数多少来分配招生名额。其中首要和关键的一点,就是均衡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招生名额分配。当然,这里的“均衡”不是绝对按照同一比例分配,可以有所倾斜,可以分步骤实施,以扭转现在一些重点高校在本地动辄招生几百人,而在其他省份只招几十人的现象。

[快报再评]

教育公平的重要性已经不用论证了。坚持不公平做法的人,他们强调的是“实际困难”,也就是现实利益如何均衡。清华大学校长就站出来了,在全国统一高考分数线还做不到。我们承认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这篇文章讲得更有道理,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北大清华是中国的北大清华,不是北京人的北大清华。不是有段语录说过,世界上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实现教育公平就是大道理。

高官们不怕“高调问政”

在昨日的全国政协文艺组分组讨论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孙萍毫不留情地当众炮轰教育部部长周济。她直指周济在回复提案有关事宜时“说话太不负责任”。

(《现代快报》3月11日)

[中网一评]

孙萍炮轰周济,有点像2006年两会上,钟南山就药价虚高向药监局讨说法。他在谈到“一药多名”现象时,非常“高调”地问道:“药监局的领导来了没有?我要问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当着匆匆赶来的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张敬礼的面,钟南山院士举例说:“一个‘罗红霉素’,品种就达40多种。我当了45年大夫,在查房时也几乎看不懂。”他质问:“这些所谓‘新药’五花八门,我就想不明白,这些批号都是怎么拿到的?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

孙萍毫不留情地当众炮轰教育部部长周济,类似于钟南山的“高调”问政。听,“堂堂一个教育部的部长,竟然用这样的话来回复我们,太不负责任了!”孙萍委员“咄咄逼人”的气势堪比钟南山。

期待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高调问

↓“孙萍委员当众炮轰周济也是高调问政” 中国网 3月12日 作者 王旭东

政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不仅是数量上的增加,也包括问政质量的提升;不仅有高调的问政,还要有高调的回应,以及工作中的问题能得到切实解决。

[快报再评]

今年的两会特别热闹,代表和委员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可喜的进步。你看,不仅政协委员孙萍如此,李金华等委员“炮轰”发改委更尖锐,说它根本就不配牵头搞机构改革。不过,说到“高调的问政,还要有高调的回应”就不那么令人乐观了。那么严重的雪灾刚过去,对于代表委员和舆论的质疑,铁道部的副部长居然用得意洋洋的口吻回应说铁道部的工作至少可以打90分;气象局的高官不是谦虚地解释,而是用挑战的口吻回答自己做得无可指责;而卫生部长用几乎是满不在乎地大度口吻说,他们准备还挨批十到二十年!他们的回应

还不够“高调”吗?“公仆”对“主人”为何没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态度?他不怕得罪你们!这是问题的要害——权力从哪里来。

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梁文道先生,写了篇《听电话的政治学》,他说:据说中国的政治越来越开明,越来越注重民意了,证据之一是有些地方官员开始公布自己和下属的电话;证据之二是两会期间,各大网站论坛都开了专页让网民提意见给领导人。可是在我看来,在国家两大民意代表机构正在召开一年一度最重要的大会时,这些好消息就是最好的讽刺。假如政协和人大真能如实代表全国各地各阶层的民意的话,假如他们全都有机会把自己在不同地方不同领域收集到的意见带到最高层的话,假如整个政府的决策真的来自于对这些意见的尊重和分析的话;我们还用得着让那些用心良好的官员忙着接电话,还用得着领导人在网上“微服出访”吗?——是的,代表与委员的功夫应该在会下,在平常。

郭同志当天究竟干的什么公务

郭世忠生前是河南省信阳市新县人口计生委总支书记、主任,2月27日凌晨,郭世忠因“公务”酒后猝死。28日,该县发文追授他为“优秀共产党员”,追记郭世忠个人三等功。

(《东方今报》3月11日)

[时报一评]

“河南新县回应官员应酬饮酒过度死亡事件:死因是积劳成疾并非醉死,生前就有表彰计划。”

瞧瞧,该县新闻科的夏科长给公众上了一堂多么精彩的哲学课: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郭世忠之所以会“突发脑溢血”,“生前就有高血压”是内因,“工作劳累、积劳成疾”则是外因,而“醉酒”只能说是一个细枝末节。况且他“工作期间从来不休息”,酒足饭饱歇歇娱乐,那也是为了“一起讨论工作”。郭世忠同志为了更多、更快、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英年早逝,难道还当不得“因公殉职在工作岗位”的美名吗?

虽然这样的“正名”过程太过强悍不好让人信服,但如果谁说这完全是信口雌黄狡辩抵赖,我第一个要打

↓“酒烈士”:强悍而靠不住的正名过程 《信息时报》3月13日 作者 李斌

抱不平。毕竟他是接受下属(乡里的计生干部)的邀请,没必要像河北那个可怜的审计员张洪涛一样为应酬领导舍命陪喝酒。“饮酒过度”云云,大可质疑。

郭世忠同志不是第一个“醉酒殉职”的“烈士”,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人在官场漂,哪能不喝高?”迎来送往觥筹交错乃官场习俗嘛。今日郭世忠同志尽享哀荣,当地其他领导不定什么时候在酒桌上有个三长两短,也可以照此模式办理。加之郭世忠同志所领导部门有超生罚款权力,是肥缺单位,利益关系复杂。得到表彰也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

问题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搞名誉批发追授表彰,总归显得猴急了一点。古人都知道“高处不胜寒”,一句“忠于职守,忘我工作,不甘落后,勇争一流,爱岗敬业”的断语,分明是把他抬到了高度正义的天台上。而事实上架势摆得太足,非但于事无补,反倒可能自取其辱。

《信息时报》3月13日 作者 李斌

[快报再评]

人是要有点自我安慰的阿Q精神的。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后续报道,新县县委目前已停止追记郭世忠同志三等功的办理手续,县政府已收回个人荣誉称号。谁说我们的舆论监督是说了白说呀?谁说新县县委、县政府政治水平不高呀?我们应该看到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对网络可带来社会进步抱有信心;我们也应该相信地方官员知错是能改的。

那么,我们还能不能深入两步追问:一,郭同志当天究竟干的什么公务,这酒钱从何而来?没有违反午餐的禁酒令就一切OK了,廉洁政府的建设标准不该这么低吧?追授个人荣誉称号的荒谬决策是如何形成的,谁应该对此负责?二,这样的事在全国有没有普遍性,对死去的官员追授个人荣誉称号,只有河南、内蒙古各一例吗?

——本版特约主持人
鄢烈山

资深报纸编辑,专栏作家。新时期中国报刊新锐评论作者的代表之一。主持多个评论专栏,其中以激浊扬清、针砭时弊为宗旨的专栏《南方周末》的“纵横谈”影响最广、最受读者喜爱,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好评。